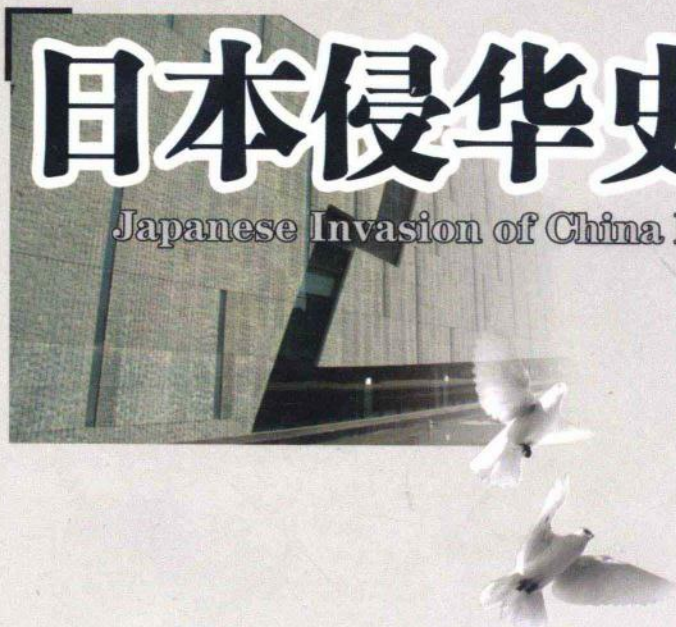


日本侵华史研究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History Research

2013·第3卷



南京出版社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History Research

日本侵华史研究

(原《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学术顾问

汤重南 张 健 刘江永 张伯兴 张宪文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朱成山

副主任 邵建国 翟 新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振犊 王卫星 王伟民 孙宅巍 艾德林 朱成山 朱同芳

张 生 张连红 孟国祥 陈俊峰 邵建国 经盛鸿 侯曙光

徐康英 程永明 曾向东 翟 新

主编 朱成山 执行主编 曾向东

中国日本史学会日本侵华史专业委员会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南京出版社

日本侵華史研究

2013 No.3

目 次

歴史を正しく認識することと民族間の和解について…………… 胡令遠 (1)

南京における日本軍「慰安所」と「慰安婦」について…………… 経盛鴻 胡卓然 (10)

南京大虐殺の一次史料について…………… 徐立剛 (26)

日本のA級戦犯武藤章…………… 朱玲 劉広建 (37)

田中角栄が中日国交正常化を実現する原因…………… 張躍斌 (44)

中日関係における日本民間友好団体の重要な役割…………… 宋偉宏 滕飛 (54)

日本社会の右傾化と相対化意識…………… 紀廷許 (61)

スパイ先行・資本浸透及び「女性先駆け」の日本人グループ

——中国東北地方における近代以来日本人のスパイ及び入植活動…………… 王希亮 (68)

江陰戦いの経緯と損得…………… 張蘇贛 (78)

自衛隊関係戦争記念館問題

——加害の隠蔽・南京と重慶……………【日】南守夫 文 芦鵬 訳 (95)

南京事件前後における軍慰安所の設置と運営

——南京・上海・揚州の軍慰安所と

上海派遣軍 (1937-1938)……………【日】吉見義明 文 齊方 訳 (105)

アメリカが記録した南京大虐殺の史料から

見る替えられない証明力…………… 張生 (115)

鮮明な国際性をもつ南京大虐殺事件…………… 姜良芹 (120)

南京の地位と価値にめぐる中日双方の認識差は

南京大虐殺を引き起こした一つの原因である…………… 邢燁 (128)

東アジア史研究領域における重要な成果

——『清末中国と日本—宮廷・変法・革命』……………【日】狭間直樹 文 連会新 訳 (131)

역사에 직면 및 민족화해후링우원	후링원 (1)
-------------------------	---------

난징에서 일본군의 《위안소》와 《위안부》 논술	징성홍 후주위란 (10)
난징대학살기간 직접 형성된 유관 서류 논술	쉬리강 (26)
일본A급전범 무토아키라	주링 류광지엔 (37)

다나카 가쿠에이가 중일 국교 정상화 실현의 원인분석	장우에빈 (44)
일본 민간우호단체가 중일관계중의 중요 작용	송위홍 텅후위 (54)
일본사회의 우파화와 그 상대화 의식	지팅쉬 (61)

스파이선행 자본침투화 《여성개척자》의 일본인류 ——근대 일본인이 동북을 잠식할시 및 식민탐색	왕시량 (68)
장인 전쟁의 경과와 득실	장수간 (78)

일본자위대가 건설한 전쟁박물관과 유관 문제 ——난징대학살,충칭대폭격등 가해사건의 숨김 난징사건전후 일본위안소의 개설과 운영	[일]미나미 모리오 글 루평 번역 (95)
——난징,상하이,양저우의 일본군위 안소와 상하이 파견(1937-1938)	[일]요시미 요시아키 글 치방 번역 (1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侵华史研究. 2013.第3卷 / 朱成山主编. —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13.9
ISBN978-7-5533-0348-2

I. ①日… II. ①朱… III. 日本-侵华-历史-研
究IV. ①K265.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3857号

书名: 日本侵华史研究 2013·第3卷

主编: 朱成山 执行主编: 曾向东

出版发行: 南京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老虎桥18-1号 邮编: 210018

网址: <http://www.nj1937.org>

联系电话: 025-83283871(营销) 025-83283883(编务)

电子信箱: ppcpalm@126.com

责任编辑: 朱天乐 装帧设计: 肖千浩 外文翻译: 【英】王山峰 【日】芦鹏 【韩】金海燕

印刷: 南京碧峰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889×1194毫米 1/16

印张: 8.75 字数: 190千

版次: 2013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978-7-5533-0348-2

印数: 2000册

定价: 20.00元

南京版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特稿

直面历史与民族和解 胡令远(1)

南京大屠杀研究

南京日军“慰安所”与“慰安妇”概论 经盛鸿 胡卓然(10)

南京大屠杀期间直接形成的相关档案述论 徐立刚(26)

日本甲级战犯武藤 朱玲 刘广建(37)

学术探讨

试析田中角荣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原因 张跃斌(44)

日本民间友好团体在中日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宋伟宏 滕飞(54)

日本社会的右倾化与相对化意识 纪廷许(61)

相关史研究

间谍先行·资本渗透与“女性先驱”的日本人流

——近代日本人染指东北之始及殖民谋求 王希亮(68)

江阴阻敌战的经过与得失 张苏赣(78)

域外研究

日本自卫队所建战争博物馆相关问题

——对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等加害事件的隐匿……………【日】南守夫文 芦鹏译(95)

南京事件前后日军慰安所的开设与运作

——南京·上海·扬州的日军慰安所与上海派遣军(1937—1938)……………【日】吉见义明文 齐方译(105)

学术文摘

美国文本记录的南京大屠杀具有无可替代的证明力……………张 生(115)

南京大屠杀事件具有鲜明的国际性特征……………姜良芹(120)

中日双方对南京的地位与价值的认识差异是导致南京大屠杀的一大成因……………邢 烨(128)

书 评

东亚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

——评《清末中国与日本——宫廷·变法·革命》……………【日】狭间直树文 连会新译(131)

日本侵华史研究
(原《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ppcaplm@126.com www.nj1937.org

2013·第3卷

总No.19

目 录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History Research

Main Contents

2013 No.3

Facing History and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Hu Lingyuan (1)

Introduction of Nanjing Brothels And Comfort Women Jing Shenghong Hu Zhuoran(10)

Analysis of Files Directly Formed during Nanjing Massacre Xu Ligang(26)

Muto Akira: Japanese Class-A War Criminals.....Zhu Ling Liu Guangjian(37)

Analysis of Tanaka Kakuei's Reason for The
Sino-Japanese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Zhang Yuebin(44)

The Important Role of Japanese Non-governmental Friendship..... Song Weihong Teng Fei(54)

Organizations Played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Ji Tingxu(61)

Right And Relative Consciousness of Japanese Society
Spy Firstly, Capital Penetration and The Female Pioneers And Stream of Japan People..... Wang Xiliang(68)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Japanese had a hand and colonial to northeast..... Zhang Sugan(78)

The Experience And Gains& Losses of Jiangyin Fighting Battle
Issues Related to Japan Self-Defense Team Built The War Museum
——The hide of harm events Nanjing massacre,the bombing of Chongqing..... 【Japanese】 Minami Morio(95)
Japanese Troops' Brothels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 around Nanjing Incident
-----Brothels established in Nanjing, Shanghai, Yangzhou and
Shanghai Detached Army(1937-1938)..... 【Japanese】 Yoshimi Yoshiki(105)

Texts of Nanjing Massacre Recor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re Irreplaceable Testifies Zhang Sheng(115)
Nanjing Massacre Shows Sharp-cut International Characteristic Jiang Liangqin(120)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ino-Japanese Recognize of Status And Value of
Nanjing Is An Underlying Cause of Nanjing massacreXing Ye(128)

One Important Result of Asian Modern History
——O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Japan—Palace, Political Reform, Revolution.....【Japanese】 Naoki(131)

直面历史与民族和解

胡令远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上海 200433)

摘要:在一般国际关系意义上的所谓政治、经济、文化之外,“历史认识”问题也是中日关系的结构性要素,这是由两国关系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即便是目前白热化的钓鱼岛主权之争,也与中日两国的特殊历史以及由此产生的“历史认识”问题纠结在一起。不言而喻,“直面历史”,是中日间实现民族和解、和平解决钓鱼岛争端的前提。战后,日本政界的“保守主流”及其余绪,肆意歪曲历史,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阻力,而敢于“直面历史”的日本政治家,则成为重要的推手。要实现真正的民族和解,在“直面历史”的基础上,还需“超越历史”。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和注重“历史的人性侧面”,是实现这一“超越”的重要路径选择。

关键词:直面历史;民族和解;超越历史

一、引子

2012年9月10日,日本民主党野田佳彦政权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执意将钓鱼岛正式“国有化”,使中日关系跌入1972年邦交恢复以来的最低谷,而且带来十分严重的后遗症。去年日本适值大选,安倍晋三借机趁势而发,率领自民党夺得政权。他本人也“梅开二度”,重新登上首相宝座。善良的人们基于其2006年第一次当选首相后,改变小泉纯一郎以首相身份多次顽固地参拜靖国神社从而给中日关系带来严重伤害的状况、积极推动中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举措,因而对安倍政权抱有期待。然而,安倍上台后更加变本加厉,不仅在钓鱼岛问题上,而且在包括历史认识问题等攸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时等众多领域,全面挑战中日关系,使两国关系直面深刻的危机和难以破解的僵局,时至今日,尚未看到解冻的迹象。

中日关系形成这种局面,不言而喻其原因是复杂而深刻的。择其要而言之,如日本从传统的地缘政治思想出发,借美国重返东亚的机会,以制衡日益强大的邻国中国等等。但在中日关系中,特别在这次的所谓“购岛闹剧”中,我认为还有一个绕不开的要害,那就是中日间特殊的历史。

诚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钓鱼岛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历史问题”。理由有三:首先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的“历史问题”,也即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钓鱼岛应与台湾一起归还中国;第二,钓鱼岛本身是日本利用甲午战争从中国窃取的;第三,日本无视从明代以来历史资料明确记述钓鱼岛为中国最早发现和管辖的历史事实。

如果能够真诚地面对这样的历史事实,就不能得出所谓钓鱼岛主权归属“不存在争议”这样的乖离历史真实的说法。就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样——它是一段历史真实的记录 and 见证,可谓铁证如山,但日本的右翼分子和政客,不仅对此视而不见,而且极尽歪曲与抹煞之能事!

所以,钓鱼岛问题要想和平解决,中日之间要想实现真正的民族和解。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日本必须要“直面历史”。

虽然最近很多人都在说现在抗日连续剧有些“泛滥成灾”,我虽也有同感;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这样的“历史记忆”难以一笔勾销。因钓鱼岛主权归属的争端,可以说使中日两国之间“旧恨”加“新仇”,民族感情受到很深的伤害。

在刚结束的日本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获胜。今后的三年中,日本没有众、参两院的所谓“国政选举”,如果没有突发的重大危机,自民党起码将执政三年,安倍内阁也可能成为长期政权。在过去“十年十相”的政治生态,短期政权很难实现一些重大的政治目标,而安倍执政的首要政治诉求就是要修改和平宪法,现在又有钓鱼岛领土主权争议可资利用于煽动极端民族主义和“中国威胁论”,可以说安倍获得了一定的“历史机遇”。但另一方面,虽然这次参议院选举结束了执政党和在野党分别主导众、参两院的“拧劲国会”的局面,但众所周知,作为执政联盟的公明党并不赞成修改和平宪法。如此,即便自民党联合赞成修改和平宪法的维新会、大家党,但仍达不到须众、参两院 2/3 以上赞成方能修宪的法定要求。但安倍不会轻言放弃,他一方面积极推动首先修正宪法第 96 条,以便降低修宪门槛,即众、参两院以及国民投票只要简单半数赞成即可。因为事涉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又是特别条款,理所当然,这也并非能够轻而易举遂安倍所愿之事。因而,与此同时,安倍政权拟通过无需修宪,而通过所谓宪法解释,首先实现“集体自卫权”。如果能获得“集体自卫权”,可以大大强化和深化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因而得到因经济难堪重负而消减军事预算、自觉力量不足的美国的默许。日前,安倍成立了由相关主要阁僚和专家组成的专门机构,就实现集体自卫权的法理、具体举措等,在进行梳理、研判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方略、方案和具体推进的步骤等,从而由务虚走向切实推进的务实阶段。

如前所述,相对安定的政权,又得到世界警察美国的默许,同时又以强邻中国的威胁为口实,可以说安倍政权获得了实现集体自卫权的有利的内外条件。因而,达成这一目标,已经具有很大的可能性。而这对日本国民来说,真的是福音吗?

本来,作为主权国家,日本获得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这一“自然权利”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为什么这一“理所当然”的事情,却大费周章呢?说到底,无论是战后至今日本拥有、但不使用这一权利,还是今天要“重获”这一权利及由此引发的问題,都与日本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对这次战争的态度——

这一“历史”和“历史认识”问题有“不解之缘”。以战后日本的社会党为主的革新势力和日本国民出于对战争的反省为组织和思想基础,以和平宪法的制约为制度要素,回复主权以后的日本拥有,但不使用集体自卫权——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由“历史”决定的;而安倍在重掌政权后的今年 4 月还表示“侵略的定义在学术乃至国际上都没有定论”、副首相麻生太郎在 8 月初鼓吹日本现在的修宪要像纳粹那样“安静地修改魏玛宪法”,由这样肆无忌惮地否定日本侵略历史的右翼政治家主导,在他们手里日本启动集体自卫权这样的军事举措,而且一旦实行集体自卫权,“专守防卫”的理念和原则、“无核三原则”、“武器出口三原则”、国防费限制在 GDP 的 1% 等,都将相应地受到冲击,日本的军事科技研发,军工产业的扩大和提速都势在必行——这样的一种趋势,深受日本侵略战争之害的亚洲特别是东亚的人民对此所怀抱的忧虑、对日本右翼政客此种行为的质疑和愤懑,也是极为自然和理所当然的。质言之,问题的焦点,不在于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这件事情的本身,而在于它的前提,这个前提不言而喻,在于日本的掌权者如何认识二战中日本国家行为的性质——这一“历史认识”问题。如果这个前提没有解决,修改和平宪法、行使集体自卫权等,就必然缺乏道德基础和法理依据,人们就有充分的理由,质疑日本的右翼政客究竟要把日本带向何方,而这正与他们痛苦的“历史记忆”和对未来的担忧,有着内在的逻辑性关联。

直面目前尚难以破解的中日关系的僵局、日本右翼政客咄咄逼人的修宪步伐,善良的人们的忧虑和担心是自然的;而对于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人们也很难乐观,钓鱼岛问题的和平解决任重道远,东亚两个大国间的民族和解也似乎遥不可及。但如果回顾一下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一方面有岸信介、石原慎太郎、安倍晋三、麻生太郎之类右翼政客否定日本侵略历史,也有像大平正芳、鸠山由纪夫、村山富市、河野洋平、加藤紘一等从历史真实出发,对中国人民真心道歉的政治家,还包括像东史郎这样的真心谢罪并积极揭露、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普通日本国民。

其实,战后中日两国人民为实现民族和解作出了巨大努力。对此,我们有必要做一简略回顾和分析。这样,有助于我们思考今天的中日关系及其走向。

二、战后中日实现民族和解的努力

(一)文化交流化解心结

中日两国之间,不仅仅是一般国际关系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如前所说,还有着特殊的“历史情结”。对于长期战争所留下的深刻创伤,通过素有传统的、柔性的文化交流,达成化解历史恩怨的“心结”,是不可或缺的。为此,中国政府和两国的有识之士做了大量春风化雨的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成效也是巨大的,特别是在恢复邦交方面,构成了“渐进积累”、“水到渠成”的重要部分。

战后的中日文化交流,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战后至邦交恢复;1972年至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至现在。

其中的第一阶段具有特殊价值,它显现出战后中日文化交流的基本性格,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其主要特点如下:

1. 文化交流所产生的“连带感”

即在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中,中国和日本的所谓“同文同种”被特别强调。尤其是中日间2000年以上的文化渊源,唤起了人们美好的“历史记忆”,由此所产生的两个民族间的文化上的“连带感”,对于化解那场刚刚过去的悲惨的战争所造成的民族感情的坚冰,起到了无可代替的作用。如梅兰芳大师以62岁高龄赴日巡回演出、敦煌学家常书鸿与日本的艺术交流、日本松山芭蕾舞团的访中演出、两国的文物交流等,都曾引起极大的轰动和持久影响。

2. 文化交流及其目的的道义感

多数日本的文化人,包括普通的日本民众,出于对刚过去不久的侵略战争的内疚和反省,觉得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其中包括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帮助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等,作为对中国人民的道义补偿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故而在当时的中日文化交流中,充满一种让中国人非常感动的强烈的道义感氛围。而在中国方面,在文化交流活动

中,一直强调那段不幸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而对日本在战后未能得到真正的独立和民主表示深切同情;同时,对他们争取独立和民主的正义斗争给予坚决支持,也是中国人义不容辞的道义责任。如巴金、老舍、郭沫若、木下顺二、茅诚司、南博等艺术家和学者的活动,可称代表。

3. 实现政治诉求的文化交流

这一时期文化交流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它的强烈的政治诉求。具体来说,就是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为最主要的政治目标。譬如“乒乓外交”、“兰花外交”等,可以说文化交流对两国的政治生活给予了重要影响,产生了无可取代的特殊效果。

4. 文化交流的韧性

在当时的日本,由民间推动的文化交流常常受到打压。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特别在岸信介、佐藤荣作内阁时期,两国在商贸等几乎所有领域的交往断绝的情况下,文化交流却被顽强地坚持下来,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以至于由于小泉多次参拜靖国神社从而使中日关系处于严峻的冰冻期时,中日有识之士依然尝试以加强文化交流来打破僵局。

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之所以具备以上特点,虽然一方面与当时特殊的历史和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但另一方面它也与中日之间传统的历史文化关系紧密相连。这样的一种情形,可以说明在国际关系中,虽然人们一般总是以政治、经济、文化这样的排序以见其主次之分,虽然我们也不赞成文化决定论,但相对于政治、经济的易变性,文化的作用却具有恒常性和超越性,也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在文化上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的国家之间,文化的要素更有着特别的功用。

以上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中日关系面临困难的状况下,化解民族间的情感矛盾,实现民族和解,推进文化交流依然是一条重要的路径。除了顽固坚持保守、反动的历史观,无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这一铁证如山的历史事实的少数右翼政客,笔者相信广大有良知的日本国民是有清醒认识的,如前所述,这也正是战后至今日本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所在。现在,领土争端与历史问题纠结在一起,使中日关

系、国民感情复杂化。正因为如此,加强以文化为媒介的民间交流,对于心平气和地厘清历史事实,增进相互了解与理解,最大限度争取领土问题的合理、和平解决,实现民族和解,尤为必要和重要。

(二) 围绕“历史问题”的解读

1. 关于历史问题的“道德诉求”与“利益诉求”

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并不是一种外交上的“利益诉求”,更不是所谓一张外交上的“牌”,实质上是一种“道德诉求”。而且这种道德诉求,一方面可以说是基于现代国际关系的法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它是一种植根于儒家思想的文化现象。直白地说,就是做了错事、坏事,首先要承认,这是重新做人的前提,一个民族亦然。所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耻近乎勇”,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和道德。因为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仁德”,所以中国人的这一诉求必然表现出植根于这一文化传统的“执著性”。日本右翼政客有时也会言不由衷、轻描淡写地说,就上次的战争日本已经多次道过歉了,中国人动辄拿历史问题说事,无非是把它当牌打云云。这种策略上的外交辞令,当然丝毫无助于基于历史事实的民族和解。此外,中国人并不乏儒家的“恕道”精神,这在战争赔偿问题上可见一斑。

2. 中日两国的民族“悲情主义”

自近代西力东渐乃至战后,中日两国逐渐形成了各自的历史“悲情主义”,并伴之以“受害者”的民族心理。此种心理,增加了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日本对中国人的态度和行为理解的困难性和复杂性。典型的事例是日本遭受原子弹爆炸一事。凡事皆有其发生、发展的因果和逻辑关系,使用原子弹这样的毁灭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正当性,一直受到质疑,但日本在中国战场上多次使用毒气弹等化学武器,也难逃“五十步”与“百步”之嫌。“受害者”抑或“加害者”,都只能是基于事实和逻辑而得出的结论。日本国民不言而喻是受害者,是军国主义的直接受害者,而“原爆”,正是在军国主义危害的延长线上。它带来的悲情主义,它造成的日美间的精神伤痕,也并不是日美同盟能轻易抹平的。民族和解、历史认识、战争与和平,这些人类依然直面的基本课题,也依然在拷问人类的良知和考验人类的智慧。

3. 关于“爱国主义教育”

在日本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说法,即中国共产党为了强调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因而一直以来过度地进行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而这样的做法给中日关系带来负面影响,因为这很容易触发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云云。另外,战后的日本人对战前和战中以皇国史观为基础的所谓爱国主义教育的欺骗性及其给日本带来的巨大灾难记忆犹新,大多对其抱有强烈的反感,这也增添了日本人对所谓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复杂心理。

实际上,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有其自身的历史逻辑,把它归咎于某个政党的党略,是失之于简单的;而它与作为侵略的思想工具的日本的爱国主义教育,更是不可同日而语,是有本质区别的两码事。近代以来,中国多难兴邦,让青年人了解这段中华民族充满屈辱、不懈奋斗的历史,最起码可以使他们明白,由于国家贫弱,父祖受尽列强欺侮,而中国强大了,要以当年的日本为鉴戒。让年轻人了解和正确认识本民族的历史,不言而喻是实现与其他民族和解、和谐相处的首要前提。

(三) 中日两国高层的努力

相对于现今中日关系的严峻局面,战后特别是邦交正常化以后的多数时期,两国关系也有过蜜月期以及合作多于摩擦时期。其间,两国高层也就实现民族和解做出过诸多努力。譬如中日两国政府共同组织历史研究的项目,包括许可中日韩共同编纂、出版教科书等。半官方的如日本“国际友好协会(IFA)”在中日以及日韩间连续实施以“历史教育交流”为主题的合作项目,为东亚三个国家就历史认识等问题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尽管现在的民调显示中日两国的好感度大幅下滑,未免让人们对实现真正的民族和解有所悲观。但多年来民间和双方高层对此所做的努力,依然具有深厚的基础,这也是毋庸置疑的。

三、实现民族和解的两大对立要素分析

论及直面历史与实现民族和解的关系时,自然使我们联想到与此相关的日本政坛的两大对立要素。不言而喻,他们代表了战后日本政界精神史、思想史的两个方向;而且,饶有意味的是,这与他们所

在的党派并无必然的联系。

(一)“保守主流”的历史观及其影响

所谓“保守主流”，众所周知冷战时期以吉田茂→岸信介→佐藤荣作为其代表，而冷战后则以小泉纯一郎→麻生太郎→安倍晋三为其“余绪”。前者所秉持的历史和政治理念，概括起来主要有：天皇主义；国家主义；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等。^[1]其中，吉田茂虽以“亲英美”而闻名，但他之所以被称为战后日本“保守主流”的鼻祖，仅从他对待天皇的态度，就不难看出其深厚的保守意识的渊源所自。1952年，年轻气盛的中曾根康弘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就天皇退位问题向吉田首相质问时，吉田以严厉的口吻回答说，抱有这种希望的人，我认为是“非国民”。^[2]战后初期，东京大学校长南原繁教授在一次演讲中指出，迄今为止，日本民族存在着一种心理性缺陷，即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意识乃至以此为基础的理想的欠缺，这就容易形成一种“特有的国体观念”并盲从于少数人。而这正是这次战争及战败的根本原因，是日本社会依然残存的“封建性精神和制度”的证据。众所周知，所谓“特有的国体观念”即以天皇为核心的皇国、神国观念。南原进而指出，即便是天皇对这次战争不负政治上、法律上的责任，但“道德上、精神上”的责任是难以逃避的。因而，“天皇退位说”也就成为逻辑性结论。^[3]这无疑戳到了吉田们的痛处，他气急败坏地斥责南原为“曲学阿世”之徒。另外，吉田茂在立明仁亲王为太子的典礼上，署名“臣茂”一事也曾轰动一时。对此，中曾根指出：“这让人联想起——吉田拥护天皇制，总理大臣在天皇之下、凭借其权威施行政治——依然以战前的意识担当着总理大臣……在‘臣’这个词只保留在词典里的民主主义时代，吉田使用那样的词汇，我觉得他并没有拒绝保守主义的源头。”^[4]

而岸信介被普遍认为是把战前和战后的保守主义连接起来的政客，连他本人也不讳言，在战前，他的思想和价值理念主要来源于东京大学求学时代的老师上杉慎吾的“国粹主义”、北一辉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大川周明的“大亚洲主义”，曾彻夜抄写当时秘密出版的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5]以此为思想基础和价值取向，他积极参与

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以致成为甲级战犯嫌疑，而且在战后一直顽固地否认战争的侵略性质：他曾在鸭巢监狱赋诗明志：“名声只要能维持即可，但即使到下辈子，也要把这场战争的正确性讲给人听。”^[6]因而，其与在政治立场、历史观、价值理念方面声气相通的胞弟佐藤荣作执掌日本权柄的10余年间，顽固地坚持反华反共立场，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绊脚石，也就不足为怪了。

而小泉纯一郎→麻生太郎→安倍晋三等，或如小泉顽固地坚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或如安倍多次表示修正“村山谈话”、“河野谈话”，甚至以首相身份在公开场合高呼“天皇万岁”等，说明他们与吉田茂→岸信介→佐藤荣作为代表的“保守主流”在思想、历史观、价值取向上“一脉相传”的继承性；另外，小泉在对中ODA项目中图谋塞进“民主”、“法制”等价值内涵的政治条件，麻生、安倍则祭出“价值观外交”的旗帜。可以说，他们以反动的历史观来挑战人类道德理念的底线，而以所谓“价值观外交”来挑战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实际上，他们所秉持的“历史观”和标榜的“价值观”之间的悖论是显而易见的，譬如，安倍无论在前一个任期中，还是这次的“梅开二度”，都多次对严重侵犯妇女的基本人权和人格的“慰安妇”问题，发表了错误观点，遭到包括美国、欧洲议会的非难和谴责。

他们的对中外交有三个共同点：一是“向美一边倒”，以图挟美制中；二是强调“政经分离”，即一方面从经贸上从中国捞好处，同时在政治上与中国拉开距离；三是不敢正视或有意歪曲历史，在历史上挑战中国。不言而喻，他们是中日间真正实现民族和解的主要障碍。

(二)致力于中日“精神链接”的政治家及其意义

与前述“保守主流”及其“余绪”在历史观、价值理念等精神领域挑战中国不同，在战后的日本，还存在着以大平正芳→鸠山由纪夫→福田康夫等为代表的，在致力于中日经济合作的同时，也在历史观、价值理念等方面努力寻求两国的“链接”或“融合”的一类政治家。

如所周知，大平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和平友

好条约得以签订的主要推手和功臣。他的中国观,所依据的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而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他指出:“近一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是遭受以西欧为首、也包括日本等列强任意掠夺的漫长的苦难历史。直到最近,中国才摆脱那一历史阶段,获得了独立自主。”^[7]与此相关联,他认为作为“加害者”的日本,对遭受侵略的中国,应该进行“深刻反省”。正是出于这样的历史观,除了前述两项功绩之外,他还经过艰苦努力,力排岸信介等“台湾帮”干扰,促成了《中日航空运输协定》的签订。他当选首相之后,通过 ODA 等方式向中国提供巨额贷款,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特别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也为两国的经济合作注入了活力。

而民主党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由源于欧洲的“友爱理念”与儒家文化的“和”的结合,展现出一种具有超越感的宏大叙事的精神风范,而他于中日关系最困难的 2013 年 1 月 17 日前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凭吊遇难的中国人,这一非凡的举动所反映的历史观和勇气,与他从祖父那里继承的、已经根深蒂固的上述价值理念不无内在关联。^[8]

在战后日本所有的政治家中,有意识地致力于中日两国在历史观、价值理念等精神领域的“链接”以期“融合”,同时又努力拓展两国经济合作的深度与广度的,则非福田康夫前首相莫属。他的努力,使中日关系出现了“新内涵”与“新向度”。^[9]其标志性的工作,便是 2008 年他与胡锦涛主席共同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其中的如下表述:中日两国“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强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是前所未有的。它表示,中日两国在历史上曾经拥有过“共同的精神家园”,以此为基础,经过双方共同努力,结束现今的“平行线”状态,达成两国在历史观、价值理念等精神领域的接近甚或融合,在逻辑上是应该和能够成立的。

这一观念,不要说前述“保守主流”及其“余绪”在历史观等精神领域与中国画地为牢、甚或有意割裂判若云泥,即与以源自西方的鸠山的“友爱理

念”,以及大平主要基于现实的判断和举措也有很大不同,其中的“能动”精神,还具体体现在福田与中国领导人的“身体力行”上。如福田破天荒地以首相身份探访给日本文化以深刻和长久影响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发祥地曲阜;胡主席也冒雨访问了象征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的法隆寺、唐招提寺等名胜古迹。其实,这是以“回归历史”的方式,为实现两个民族的真正和解所做努力的一部分。^[10]

大平正芳→鸠山由纪夫→福田康夫等在对华外交的实践方面,显现出如下的共同点:(1)中日美关系大致呈“等边三角形”而有向中日偏重的倾向;(2)中日两国经济上进行“广域合作”:如大平的“环太平洋合作构想”、^[11]鸠山由纪夫倡导的“东亚共同体”、福田康夫的“作为‘内海’的太平洋”设想等;(3)以和平方式解决海洋权益争端:如福田康夫内阁时期中日两国达成使东海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共识。以此为基础,2008 年 6 月 18 日发表了《关于东海中日合作的协议》,鸠山由纪夫前首相则设想中日通过“东亚共同体”这一平台,将两国利益最大化,届时钓鱼岛问题将变得微不足道,因而最终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等。

显而易见,正是由于这一类政治家的存在和努力,使我们看到日本对华政治和外交的希望所在,也是我们对两国实现真正的和解、包括领土争端的和平解决充满信心和期待。

四、结论

综上所述,作为中日两国实现真正的民族和解的前提,首先是要“直面历史”。日前刚去世的日本中国问题研究权威、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竹内实,在 1972 年中日邦交恢复、普天同庆时,却忧心忡忡地警告说,“对今后的中日关系,不应该将其描绘成玫瑰色的梦”,因为他认为中日关系取决于日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希望将来有一天的基础上“超越历史”。温家宝总理在日本国会演讲时强调,中国人民讲历史问题,并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面向未来。当日本遭受“3.11”大地震时,温总理利用到日本开会之机,不顾辐射危险,到受灾地区进行慰问。这些“心灵之旅”,增进了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的感

情。日本福田康夫首相访华时的“曲阜之行”，更是破天荒地开创了中日关系史上日本现任最高行政首长亲自到孔子故乡“朝圣”的先例，是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历史性事件。

对中日关系有着真切理解和远见卓识的福田康夫前首相通过“回归古典”，从长时段来认识和理解中日关系。通过确认中日两国曾经共同拥有的“精神家园”，意在说明今天中日两国的相互理解和信任是可能的，因为本来就有牢固的文化基础。这种文化血脉的“共源性”，同时也是2000年来中日友好的历史得以存续的基础。那么，近代以来中日间的恩怨与此相比，毕竟是短暂的，也是可以“超越”的。即便从未来着想，这种“共源性”，也为东亚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文化和感情上的便利和可能。福田访华时于北京大学的讲演中强调：“日中两国不单单是一种由利益、利害关系联接起来的存在，日中两国是具有悠久的交流之历史的邻国，共有相互的文化和传统，共有在其中相互所由成立的基盘。”

鸠山由纪夫通过提倡“东亚共同体”，意在加强中日经济文化关系，也是效法欧盟，通过把两国利益最大化，从而化解历史恩怨，把包括钓鱼岛争端在内的矛盾最小化，以求得和平解决。在欧洲，不仅仅是作为双边关系的法德，现在有50多个国家参加的，大量从事文化、历史等交流活动的“欧洲评议会”(C.E)，近年开展了一系列相互理解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的重新探讨。

在直面历史的基础上，还要“超越历史”。肯定“民族史”、“国家史”十分重要，同时，从更长的时段和更广域的空间来认识和理解历史，也即超越以上“民族史”、“国家史”的“地域史”、“国际关系(交流)史”、“文明史”以及“比较史”的导入，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仅从一国历史之视线的固定框架，会有不少无法解读清楚的领域，而只有导入地域或国际的视线，才能够更全面、更透彻的认识历史、理解历史、把握历史乃至超越历史。这对于中日两国超越近代以来各自的“国家史”、“民族史”中浓重的历史悲情主义，对于以悠久的历史中日友好传统，来超越上一世纪那50年不幸的历史，无论是在促成意识的自觉上，还是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都是不可欠缺的。

也许，只有在这个框架内，才能有助于消弭中日关系脆弱性的顽症。

另外，关于注重“历史的人性侧面”。政治、外交、战争等所构成的历史及对它们的认识固然重要，但这并非历史的全部。文化、日常生活、人自身等这些，同样也构成历史元素的“人性侧面”，也必须加以重视。前述温家宝总理在日本国会的演讲中，曾提到聂荣臻元帅在战场上救助日本孤儿美惠子，并最终将其送回亲人身边；电影《大地之子》所反映的日本残留孤儿在中国养父母的抚养下成长的真实故事；战争刚结束时中国人帮助105万日本侨民平安返回家园的历史一幕，都是感人至深、闪耀着人性光芒的。而从历史学家的家永三郎、到侵华老兵东史郎，再到直到今天无偿帮助昔日中国劳工与日本政府、企业打官司的日本律师，从他们身上也同样看到人性的光辉。正是这样的“历史的人性侧面”，使我们对中日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

(本文为作者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主办的“历史与未来”公益文化大讲堂演讲稿)

注：

[1]林尚立：《政党政治与现代化——日本的历史与现实》第六章“保守主义与国家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4][日]中曾根康弘：《中曾根康弘が語る戦後日本外交》，前掲，第88页、第89页-90页。

[3][日]丸山真男、福田歆一编：《南原繁回顧録》，东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版，P第310页-314页。

[5]每日新聞社，2003年6月，第339页-356页。

[6][日]若宫启文著、吴寄南译：《和解与民族主义》，见前，第66页。

[7]刘江永：《中日关系二十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2页。

[8]关于鸠山由纪夫前首相的“友爱理念”在中日关系上的投影，请参阅拙文“鸠山由纪夫‘友爱理念’的源流”，载于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主办《日本学刊》2009年第6期。

[9]参见吉林大学《东北亚论坛》2008年第6期拙文《试论中日关系的新向度》。

[10]请参阅拙文“试论中日关系的新向度——以福田康夫的外交遗产为中心”，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文

摘》,2009 年第 2 期。

[11] 参见五百旗头真主编、吴万虹译《战后日本外交史

(1945-2005)》(第四章第 3 节中的“福田主义与环太平洋构想”),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年版。

[责任编辑:江河]

Facing History and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Hu Lingyuan

(Center for Japanese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Professor,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recognition” is one of the structural elements in Sino-Japan relations besides the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e elements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hich is determined by the very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bilateral relationship. Even the current heated sovereignty dispute over Diaoyu Islands is also intertwined with the special Sino-Japan history and the resulting “historical recognition”. Undoubtedly, “facing history” is a prerequisite for achieving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nd reaching a peaceful settlement of the Diaoyu Islands dispute. Ever since the end of the war, the “conservative mainstream” and its remaining power in Japanese political circles deliberately have been distorting history, impeding the resolution of the above-mentioned issues, which is counteracted by some Japanese politicians with the courage to “face history”. In addition to “facing history”, it is imperative to “move beyond history” to achieve genuine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And in order to “move beyond history”, we need a broader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a focus on “the human side of history”.

KeyWords: facing history;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moving beyond history

歴史を正しく認識することと民族間の和解について

胡令遠

(復旦大学日本研究センター 教授 上海 200433)

要旨: 政治、経済、文化という所謂一般的な国際関係のほか、特殊な関係により、「歴史認識」問題も中日関係の一つ要素となっている。言わば、今の尖閣諸島紛争もそれと絡んでいる。故に、歴史を正しく認識するのは、中日間の和解を実現できる前提であると言うまでもない。戦後、日本の右翼政治家らは、歴史を歪曲してその和解実現の障碍となり、一方歴史を正しく認識できる政治家らは、その和解を進めてきた。真の民族和解を実現するために、歴史に直面すべきのうえ、歴史を乗り越えるのも大切である。歴史に対して幅広い視野で考え、また歴史における人間性が重要視されるなどは、その「超越」へのルートだろう。

キーワード: 歴史認識問題、民族和解、歴史を乗り越え

역사에 직면 및 민족화해

후령우원 (胡令远)

(복단대학일본연구센터 교수 상하이 200433)

요점:국제관계의의상에서 볼때 정치,경제,문화외 역사인식문제도 중일관계 구성의 중요한 요소이다.이는 양국 관계의 특수성에 따라 결정된다.현재 뜨거운 화제인 따위도우 주권쟁탈도 중일양국의 특수역사 및 이에 인해 생긴 역사인식문제와 얽혀있다.보다싶이 역사에 직면함은 중일간에 민족화해와 평화적으로 따위도우 쟁탈을 해결하는 조건이다.전쟁이후 일본 정치계의 보수주류 및 역사를 왜곡함은 위 문제를 해결하는 저항력이 되었고 반대로 역사에 직면하는 일본정치가는 도움이 되었다.진정한 민족해결을 실현하려면 역사에 직면하는 기초에서 《역사를 초월함》도 필요하다.더 넓은 역사시야와 《역사인간성측면을 중요시함》은 이 《초월》을 실현하는 중요한 선택이다.

키워드:역사직면,민족화해,역사초월

《日本侵华史研究》两篇文章 同期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一文

《日本侵华史研究》2013年第2卷发表的天津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乌兰图雅博士撰写的《诺门罕战役的边界纠纷探析》和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陆束屏教授撰写的《日军大屠杀后美国外交官在南京非凡的使命》两篇文章,近日同期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主办的《中国现代史》2013年第9期全文转载。

《诺门罕战役的边界纠纷探析》一文以诺门罕战役为中心,探析中蒙东部边界纠纷的历史根源,日苏关于边界问题的不同主张,以及日本的边界调查活动及其目的,并揭示了关东军由边界纠纷问题引发战争的真正意图。《日军大屠杀后美国外交官在南京非凡的使命》一文记录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守南京的美籍人士,以及南京大屠杀后返回南京的美国外交官,利用特殊的身份,在目睹、收集、调查和抗议侵华日军对在南京的美国财产和人员侵犯情况的同时,还调查和揭露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犯

下的烧、杀、淫、掠暴行,并留下了大量第一手的文献档案资料和外交文件,对保护美国财产、救济南京难民,以及见证南京大屠杀罪行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据悉,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是国内最早从事搜集、整理、存储、编辑人文社会科学信息资料的学术出版机构,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信息出版领域享有很高的品牌地位,其主办的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是了解中国现代史最新研究成果的最集中、最权威、最精华的集萃园地。两篇文章同期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是《日本侵华史研究》(原《南京大屠杀史研究》)自2008年10月创刊以来的第二次。截至目前为止,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联合主办的《日本侵华史研究》(原《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已有10篇文章被该资料中心《中国现代史》全文转载。

南京日军“慰安所”与“慰安妇”概论

经盛鸿¹ 胡卓然²

(1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南京 210097)

(2 南京市国土资源局副主任科员 南京 210005)

摘要: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日本军国主义翻案,制造种种谎言,在否定日本侵华史、否定南京大屠杀史的同时,也否定侵华日军实施的“慰安妇”制度及其罪恶。本文以战时档案、报刊资料和社会调查资料为基础,揭示了侵华日军在南京实施“慰安妇”制度的铁的事实。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南京是日本当局实施“慰安妇”制度最完善、“慰安所”与“慰安妇”数量最多的地区,也是中国妇女、韩国妇女、日本妇女以及其它国家妇女受害最严重的地方。战时日本当局作为一项重要国策制订的“慰安妇”制度及其实施,长期地、公开地、有计划地强征大批的各国妇女,为日军官兵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乃是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上罕见的反人类暴行,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忍、野蛮与暴虐。这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的铁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日本右翼势力的荒谬与无耻。

关键词:侵华日军;南京;“慰安妇”;“慰安所”;性奴隶

2013年5月13日,日本臭名昭著的右翼人士、日本维新会共同党首、大阪市市长桥下彻大放厥词,声称日本在侵华战争和二战期间,强征妇女充当“慰安妇”的制度,虽是“战争悲剧的结果”,需要理解那些被强迫成为“慰安妇”女性的感受,对她们给予应有的关心;然而,“勇敢的士兵集团在枪林弹雨中精神亢奋”,作战间隙需要“慰安妇”让他们“好好休息”;为防止发生战争胜利一方对失败一方的暴行,作为维持军纪的一种手段,像“慰安妇”这样的制度当时确有必要。桥下彻还否认日军系统性地强征“慰安妇”,称“没有证据”。他说,在欧洲和美国,日本被贴上“强奸犯国度”的标签,那是“韩国和其它国家宣传”的结果。另一个臭名昭著的日本右翼人士、日本维新会共同党首石原慎太郎“力挺”桥下彻的观点。他于5月13日在日本国会声称,桥下彻的观点没错,“军队和卖春相生相伴,如同历史原则。”

桥下彻和石原慎太郎的谬论激起了中韩等国民众的极大愤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强征“慰

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中方对日本政治人物公然发表挑战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言论表示震惊和强烈愤慨。

其实,在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在妄图为日本军国主义翻案,推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时,一直在千方百计否定日本侵华史,否定南京大屠杀史,也千方百计否定日本侵略军实施的“慰安妇”制度及其罪恶。日本右翼学者与右翼政客制造了一系列谎言,胡说“所谓的日军性奴隶根本就是莫须有的说法,而被认为是‘慰安妇’的女性,实际上就是为了赚钱的‘卖春女’”,“新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中不再写入‘慰安妇’一词是件好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样一个词根本就不存在”;甚至说:“这些亚洲妇女不能够被说成是遭到强暴,她们应该感到自豪,因为她们消除了战场上作战的男人的不安情绪,让他们得到休息,精神上得到一定的平静”等等。其荒谬、无耻、颠倒黑白竟至如此!

本文作者近几年与中、日一些学者一道,以战时档案资料和报刊资料为基础,对南京城区和郊区进